

# 再就业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深化改革

李 霁 友

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或是两者的结合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配置,都很难达到市场的完全出清,均存在着“失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宏观如此,微观就更复杂,任何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优胜劣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待业是人们经济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目前,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国企改革进入体制转轨的阵痛期,再就业已成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除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保障体制,为下岗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外,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适当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比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了解决再就业难题的又一重要出路。

## 一、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正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体现了商品的内在属性,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大于劳动力价值以外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有人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价值是由工人活劳动创造的,资本(广义上包括资本金、技术、土地产权、房屋租赁权等)作为生产要素无权分配剩余价值,只能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一种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按存在形式,把劳动分成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又称死劳动)两种。活劳动表现为工人的劳动能力,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基础和前提。物化劳动是人类劳动成果在“物”上的凝结,是对过去劳动的承认,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是活劳动的吸收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何种劳动,都参与了新价值的创造。我们认为,不管是劳动力表现形式的活劳动,还是资本化、技术化的死劳动都是对人类劳动的承认和体现,均享有剩余价值的追索权和新价值的分配权。

十五大报告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只有真正重视两种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才能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不同资源所有者开辟尽可能多的就业渠道,为各阶层劳动者提供更多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会。

## 二、我国再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体制制转型引发出很多新问题、新情况,亟待我们想办法解决。许多企业职工下岗成为目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分析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体制上看,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原来低工资形式的隐性失业,“企业办社会”,企业“大锅饭”等弊端暴露无遗,企业无力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竞争不力,企业效益低下,职工纷纷下岗。从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考虑,有限的公有资产无法吸收数量众多的国企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剩余劳动力下岗再就业成了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

第二,从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势必导致初级劳动力需求的锐减。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者的生产素质和劳动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管理层只需要少数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就可以完成原来同等的生产经营量。技术的变革、管理水平的提高,把大批初级人才抛入待业大军。

西方经济学者梅多斯认为,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产生失业的原因。70年代初由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甚至认为,应用技术将在很大程度加深失业问题,这就使得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这些说法虽有失偏颇,但足见科技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

马克思也认为,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得以在经济生活中广泛地运用,因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少量的可变资本就可能吸收大量的不变资本,这必然导致产业工人的“相对剩余”。

科教兴国是我国现阶段一项基本国策。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要求我们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管理方法。再就业只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逐步解决。

第三,经济发展周期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经济发展具有一定阶段性和周期性。在每一轮经济增长后期,大批固定资产需要重新投资或扩建,这时候需求旺盛、消费空前高涨,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表面繁荣。但因固定资产、基本设施投资不足,生产增长的后劲相对萎缩。随着经济的继续扩张,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矛盾日趋激烈,产销不对路,资金、产品大量积压,发生支付危机,最终导致职工下岗待业。

宏观上看,96年下半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于人口多,再加上原料、能源、交通运输等“瓶颈”产业的约束,即使鼓励发展个体、私营、三资企业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么多就业人口。

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除了体制因素、科技进步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斥以及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影响外,职工自身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表现为:第一,观念陈腐、思想僵化,在市场经济中,仍视国企为打不破的“铁饭碗”,重视国企,轻视集体、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把再就业看成是企业的终身聘用,忽视了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存在着市场风险。第二,拈轻怕重,眼高手低,对服务业、种养业(如承包郊区蔬菜、鸡场等)、机修业等不屑一顾,自视为城市贵族。在同一城市里,形成了工人失业、农民就业并存的局面,不注重自身技术技能的

再培训，一味靠政府、靠组织、靠企业。

### 三、再就业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利用资本的趋利性和政府法律、法律对市场的约束、保护功能，刺激生产，维护各种资源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各要素所有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合理区间，推动活劳动跟各种物化劳动的重新配置，有利于拓宽再就业门路，增强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功能，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就业，再就业与收入分配体制的关系，其实质就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大约有3亿潜在剩余劳动力（日趋缩减的农村耕地、牧地已无法吸收广大农村劳动力），城镇约有800多万职工下岗等待再就业，再就业的压力很大。鉴于我国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国有固定资产吸纳力相对偏小的状况，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应大力发展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通过对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有效的利益刺激，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达到相当高的就业率，以减缓再就业的压力。

生产力的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又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只能根据现存的生产力状况和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目前，在深化收入分配体制，逐步解决再就业的问题上，我们应着手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者能力、企业家精神等因素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资本、技术、管理才能与劳动力多种形式的结合，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新的再就业路子。

第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合理消费，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他们扩大再生产规模，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再就业机会。

第三，通过制定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但又要合理拉开个人收入的差距，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和风险意识，增强资本对下岗待培人员的粘贴性和吸纳力。

第四，在国家法律、政策范围内，允许和鼓励外商在我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并鼓励他们用所赚取的利润（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作为追加资本进行再投资。无须过分担心跨国（集团）公司对我国民族工业形成的威胁。引进外资的目的在于利用外国（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发展我国经济，实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正如列宁所说的，相对于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剩余价值的丧失，已是微不足道的了。此外，外商在我国投资建厂也为我国待岗人员提供了再就业岗位。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是对传统收入分配体制的新突破。它即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本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我们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势必为我国再就业工程开辟广阔的前程。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